

未来的地位和前途主要取决于现存的国际金融—经济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愿意赋予 G20 什么职能、愿意 G20 发挥多大作用、愿意对发展中国家做多大让步。此外, 经济是国际的, 而政治往往是本土的。G20 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世界经济领域, 在世界政治安全领域其作用是有限的, 它既不可能取代联合国, 也不可能取代北约。因此, 对 G20 未来的地位和前途目前不宜过早下结论, 须冷静观察。

尽管如此, 应该说 G20 还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好的活动平台。G20 的崛起适应了国际形势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 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合法发展”, 表明了世界特别是西方对中国崛起的认可。中国要充分利用好 G20 这个平台, 必须从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角色和定位出发。在当今国际经济格局中, 中国的角色和定位是比较复杂的、多元的, 有时甚至是矛盾的。中国一只手伸入了第一世界, 一只脚还留在了第三世界, 可是身子还卡在第二世界。中国既像“第一世界中的第三世界”, 又像“第

三世界中的第一世界”。作为一个发展的新兴大国, 中国身份的多种属性决定了其利益的多重性, 因而中国既不能像纯粹的发达国家那样行事, 也不能像典型的发展中国家那样行事, 应采取多样、灵活的策略, 积极有所作为。一方面, 中国要在 G20 框架内充当南北之间的“桥梁”, 起沟通、平衡、协调作用, 推动多边主义、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 推动和谐世界的建设和发展, 也要警惕、避免成为各种矛盾的焦点而不能自拔, 切忌木秀于林, 树大招风。另一方面, 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富有活力的新兴经济体之一, 在金融危机中发挥了挽救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作用, 人民币愈来愈成为国际化货币, 在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大大增加, 甚至出现了中美 G2 共治之说。中国已经趋近国际舞台的中央, 其国家利益特别是海外利益的拓展业已十分明显, 因而应把现有的综合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 不仅要有话语权, 而且要有决策权, 积极发挥建设性推动作用, 与其他经济体共同塑造、建设更加平等的国际秩序, 为国谋利, 为民谋福。○

中国在国际秩序转型中要有所作为

蔡拓 (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 教授)

现行国际秩序是二战后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主导下确立的, 明显反映了西方的意愿、要求与利益。冷战结束后一段时间, 由于两极格局解体和美国的超强地位, 国际秩序甚至有了美国独大的特征。今年, 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西方主导、美国独大的国际秩序的弊病暴露得更为彻底、鲜明, 已难以为继, 所以 G20 崛起乃历史之必然。它标示着现行国际秩序开始真正转型。这种转型集中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首先是权力与地位的消长及由此导致的对权力与利益重新分配的要求。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 今天新兴经济体正在以一个“群体”、“板块”的形式崛起。“金砖四国”也好, 五个发展中大国也罢, 总之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在明显提升。它们占全球

经济的比重已由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 39.7% 上升到如今的近 50%, 而外汇储备已占世界外汇储备的 75%。英国一家研究机构 2009 年 6 月发表的一项报告进一步指出, 今年美国、加拿大、欧洲这三大传统的西方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将降至 50% 以下, 这是 19 世纪中叶以来的第一次。伴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 自然就出现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要求话语权、决定权以及相关利益等问题, 这是实力政治、权力政治的基本逻辑, 想躲也躲不开。像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 不仅新兴经济群体自身明确提出了改变国际金融领域的不合理状况, 重塑国际金融秩序的要求, 就是发达国家也认为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不尽合理, 必须进行改革与完善, 以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与决定权, 进而调整利益分配

格局。

其次是关涉国际事务主导权的相应规则、制度、机制的调整与重塑。实力是国际秩序的基础,有了实力的消长,就会有调整权力与利益的要求或反映,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主动还是无奈。比如为了应对大萧条以来世界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真正提上日程。虽然美元的地位仍然难以从根本上撼动,但适度限制与平衡美元在当前国际金融机制中的独霸地位已成共识,并开始有实质性举措。再比如, G20地位的提升与作用的加强, G8+ 5的机制化倾向,表明当前的国际事务已不可能甩开发展中大国而由发达国家独自掌控,必须在制度安排上体现这种变化,创造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大国共谋人类大局、大业、大事的新机制。

实力与机制,是至今为止人们认识、审视、评判国际秩序的两个基本视角、层次、要素。它们又是国际秩序的两根支柱。今天我们讲国际秩序正面临着转型,讲 2009年是国际秩序的转型年,都是以此为依据的。这是当下国际社会主流熟悉并认同的理念、逻辑。毫无疑问,它是简明而有说服力的,从而也是我们审视当今国际秩序变迁的基本维度。

再次,国际秩序新理念的塑造。正在启动的国际秩序转型,不仅体现为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以及国际机制的调整与改革,从而推进国际关系的多极化,赋予新兴经济群体更大作用,更体现为新的规范与理念正在被更多地倡导、认同,从而在根本上塑造着一种区别于传统国际政治理念的新理念,并以此来塑造新的国际秩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国际秩序新理念的塑造才是标识当今国际秩序转型的更为重要、更为本质的特征。

2009年所显示的国际秩序转型与塑造,把中国推向国际舞台中心,不管别人(特别是西方)是忽悠中国还是真心地赞美中国,中国正在崛起的事实已无可否认,而由此产生的对中国的期待、忧虑、压力都接踵而至。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称:“历史学家将审视 2009年发生的一切,看到中国在稳定全球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英《泰晤士报》载文指出:中国已成为国际秩序变革中的关键“玩家”。中国该如何定位,中国能做些什么?

其一,中国应努力成为国际秩序的塑造者。中国的实力在迅速提升,甚至在今年至迟明年就会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规模,经济发展对能源、矿产资源的需求,庞大的消费市场等等都对当代国际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力。在全球经济下滑的大背景下,今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可能超过 50%。这一切都提升了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话语权、决定权,从而重现硬实力无可辩驳的作用。但是,中国应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硬实力的消长所诱惑。中国在推进国际秩序转型方面,应着重于软实力,在倡导、提供新的规范、理念上下功夫。理由在于,硬实力的较量是个无止境的过程,弄不好还会产生类似于“安全困境”那样的悖论。如果国际秩序的转型沿着这条旧轨进行,将不会有根本性改变,况且中国的硬实力与美国相比还相差甚远,跟美国拼硬实力绝非上策。改变人们认识和处理国际关系的理念、思维、视野,用责任、合作、共赢、和谐这些新的规范、价值、理念去引领国际秩序的重构,这才是必由之路。中国已提出和平崛起、和谐世界、共同繁荣等一系列新理念,在塑造国际秩序方面做出了明智的选择。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使这些理念更精致、更理论化,也更易于理解与操作。在成为国际秩序塑造者方面,中国必须更坚定、更自觉、更持之以恒。

其二,中国要成为国际秩序的平衡者。塑造者是中国在国际秩序转型中的较为理想的高层次目标与定位,而平衡者则是中国在国际秩序转型中较为现实的低层次目标与定位。平衡什么,平衡理想与现实,平衡硬实力与软实力,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利益共享、权利平等、民主共治是公正、合理的理想国际秩序,它是奋斗目标但不是现实。现实是西方主导国际秩序,拥有处理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决定权。以改革国际金融秩序而言,建立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是目标之一,但保持美元地位的稳固则是现实选择与需要。这是无奈也是现实,而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倡导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则可称为平衡之举。国际秩序中的硬实力看得见,摸得着,令人信服。拥有硬实力才能底气足,讲话有分量,所以中国必须发展硬实力。事实上今天中国国

际地位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凭借的正是改革 30 年来所聚集的硬实力。但如前所述,塑造新型国际关系和新型国际秩序的关键并非仅靠硬实力,还要有强大的软实力,因此中国的战略指向也应更重视加强软实力,这也是一种重要的平衡。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又需要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扮演平衡者角色。新兴大国是国际关系意义上的大国,拥有可观的实力,并能影响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的变动。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中国在经济结构、产品科技含量、人均收入、国民教育、管理水平、公民社会成熟程度、法制状况等诸多方面的确只能称作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理解发展中国家的意愿、需求、困难,从而能在重构国际秩序时予以关照。但中国同时又是一个正在崛起并给国际社会带来巨大冲击的大国,从而又要考虑这种冲击对世界,尤其是对发达国家的震撼。新兴大国的定位是恰当的,但它决不是发达国家,因为“冲击力”、“冲击性”并不等于发达。我们应明确的就是有意识地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要求,推动国际秩序渐进有序的变革。

其三,中国在国际定位中,要处理好内向型与外向型的关系。内向型着眼于自身的问题,自身的事情,自身的实力,自身的发展,这无疑是必要而合理的。不把自身的问题解决,不把自身的事情做好,不把自身的实力提高,不能保证自身的发展不断完善且可持续,那么就很难在国际舞台上有很大的作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发展自己、影响世界”是完全正确的。外向型着眼于外部世界,更多关注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在国际体系中的

影响力,以及各个层次的互动与依存中,如何合理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并不断增进人类共同利益与福祉。相比内向型而言,外向型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对外关系中的主动、积极姿态,其国际定位渗透了责任、自信和大国意识。外向型与内向型不是零和博弈、相互替代的关系,尽管双方有着各自明确的特点与取向,但毋宁说它们是一国对外战略、国际定位的两个侧面。对当代中国而言,内向型的思考与定位,有助于我们冷静地审视自身,解决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外向型的思考与定位,则有助于我们与时俱进,不断探索与回应对外关系中的新问题与新挑战,塑造大国意识与风范,担负起应尽的国际责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所以两者均不可偏废。但相对而言,从我们更熟悉、更认同的内向型定位向尚不熟悉甚至还有所争议的外向型定位的适度转型是必要而迫切的。首先是因为中国正在崛起已成为世界的共识,而一个崛起的中国必然会在国际社会扮演更重要角色。因此无论是回应国际社会的期望与质疑,还是提升自身的实力与素质,都要求反思和超越内向型国际定位,以更宏观的视野,更成熟的大国意识与心态审视和处理国际事务。其次是因为相互依存已导致国内与国际事务界限的打破。许多事情看起来似乎是国内的问题,但真正解决起来仅靠协调内部因素,处理内部关系却难有进展。这表明,局限于国内视角去解决国内问题已行不通,当代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特别是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实施“走出去”战略,防止环境污染,改变消费模式等,都关涉他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必须通盘考虑,协调各种关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才能解决。○

国际局势变化与中国话语权的提升

何 兰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大国不仅主宰着全球经济和金融事务,而且掌控着世界政治与安全问题的话语权。在为应对 20

世纪 70 年代接连发生的“美元危机”、“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而召开的法、美、日、英、意和西德六国首脑会议基础上扩大而成的八国集团